

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

——文学批评家何镇邦访谈

□王 昉



王 昉:这些年对文学批评的质疑声音不断,普遍认为当下的批评归结于各种功利性之中难以自拔。您作为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就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老批评家,对批评界的现状怎样看?

何镇邦:20世纪80年代是主题演进式的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则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轨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现在的文学批评则形成了几大块,传统文学批评、学院派批评(也属于传统批评,学院派批评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媒体批评。媒体批评现在比较普遍,媒体除了纸质媒体还有电子媒体。批评的平台日益增多,平台多起来后,各种批评现象纷至沓来,让人更觉热闹。但热闹完之后,批评的各种病态就产生得更多。这些年来大家对文学批评不太满意,无论是社会各界、文学创作领域还是文学批评界自身都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不满。文学批评不能尽到其应有的责任,从“人情批评”一直到严重的“红包批评”,再到“酷评”,文学批评失去了客观性,大多数批评只说作品的好处,而且吹捧得过分,没有客观的判定标准。“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讨论会批评。这种批评就是开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组织者给与会的批评家一定出场费、审读费,为作品造声势。研讨会上大家碍于情面,纠结于利益,当然就要多说作品的好处,而忽略掉作品的不足,这种批评当然就失却了文学批评应有的严肃性。针对这种批评的不足,批评界又产生了一种批评方式,即“酷评”。酷评并非是这样才有,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酷评的声音。现在有这样一支不大不小的酷评队伍,并且也占据了一部分阵地。酷评的效果如何?它对“人情批评”有一定的矫正,但也不是科学的,有的批评者仅仅是为了“酷评”而“酷评”,带有很多个人的情绪,不是从科学角度来判断,也并不是鲁迅所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看看酷评者的文章,有的批评家对某些人“酷”得厉害,酷得甚至不讲道理,但是对某些作品又吹捧得很过分、很肉麻。归根结底,这种批评还是从情绪出发,从个人的某个角度出发。批评的确是带有个人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能变成情绪化。所以从我的观察来看,无论是好评还是酷评,都带有个人情绪,这不是科学的。当然,批评也不是纯粹的科学,批评的基础是鉴赏,鉴赏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允许存在的。比如一个作品有的批评家给打70分,有的批评家给打65分,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我打50分,你打100分,这就是有偏见的成分在其中。现在有些评论家存在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打70分,但是给予不理智的贬低,就很伤人,或者有的过分吹捧。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两翼,如果批评出现偏颇,创作也必然受到影响。这一点,文坛内外的有识之士想必都已看得很清楚。

王 昉:除了各种研讨会,各种文学奖项与排行榜也是当

下批评界遴选作品与作家的主要方式。在您看来,评奖的导向究竟由什么因素来决定?这种方式又给批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何镇邦:这些年来文学界出现了各种评奖方式,应该说,评奖也是一种批评方式。现在全国有各种评奖,也有各种排行榜,地方上也设有各种奖项和排行榜。各种评奖有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评奖也是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排行榜也好评奖也好就是一个风向标。有的文学评奖动静闹得很大,有些文化商人也要介入,利益驱动得很厉害。一个公正的评委不会把客观的判断看得很重,而且,时间的匆忙,很多利益链的介入,也会影响他们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所以评奖当中,无论你怎么讲自己“风清气正”,都有些不正的地方,各种关系在左右着,包括组织者也要考虑他的利益关系。评奖与排行榜的不正之风也给批评带来不正之风,而且是批评界不正之风更重要的来源。

王 昉:您刚才详细分析了当下批评界的各种乱象,那么您认为造成批评界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镇邦:造成这些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学批评界自身的原因。首先是社会对批评的不宽容。现在,作家希望你说好话,不希望你批评他。一个单位也不接受客观的批评,他们都希望你讲他们的优点。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批评家的正面评价成为他们争取各种利益的砝码。而文学批评界缺乏科学的规范性也是造成批评乱象的重要原因。文学批评从文字上的批评到讨论会,再到各种评奖和排行榜,无论是好评还是酷评都缺乏客观科学性,对批评的本质和任务不了解。指望靠几个批评家来改变批评现状,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批评很活跃,但是,据我观察,媒体批评比较粗糙,对作品的解读也不是很深入细致。而高校的学院派往往用理论来框定文学实践,很少从文学现象和文本出发来进行判断。当然学院派也有一个好处,他们的批评显得比较有厚度。归根结底,批评为什么令人不满意就是缺乏客观科学性,客观就是科学性的表现。原来我本人就在批评界,现在我逐渐离开批评界,拉开了空间和时间距离,就有可能更客观地来看待批评界的问题。

王 昉:文学批评活动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文学批评活动的感性与理性主要体现在哪里?作为批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除了保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批评主体还要具备什么素质才能尽量保持批评的客观性?

何镇邦:文学批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不同于其他相对理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一种关于美和情感的创造。一个批评家没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写不出好的文章,批评家一定要有情感因素介入批评,要把自己对作品的见解通过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但是文学批评从另一层面上看,从认识把握作品的思路方面来说,又是理性的。理性就要讲科学性,所以科学性是文学批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文学批评活动只有坚持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才能对文学对象作出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批评家,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很重要,一个批评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社会判断、历史判断,就不能承担批评的责任。现在有很多历史判断都发生错误,很多批评家将历史唯心主义拿出来鼓吹,鼓吹帝王将相。究竟历史是谁创造的?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因此说情感因素、历史观、社会责任感都要具备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王 昉:对文学批评建设而言,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化、科学化?

何镇邦:对于文学批评的建设而言,科学化就是对文学批评家要有一个明确要求,要把这要求纳入科学轨道。文学批评的建设从现在来看,要匡正时弊,要解决文学批评的各种乱

象,恐怕还要靠文学批评学。大家一起来研究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它应该有的正确的轨道,不然,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有利关系在其中。批评家需要有科学的训练,要有社会责任感,正确的历史观和审美观,要有一个综合训练。我们这一代的批评人就要退了,要让新一代的批评人成长起来,我们要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学批评人创造条件。那么靠什么来培育,就是要靠建立科学的批评体系,建设文学批评学。

王 昉:您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致力于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文学批评学是一种怎样的学科体系,它的主要概念与主要范畴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性质与任务又是什么?建设这个学科体系需要做哪些具体的知识与理论储备工作?

何镇邦:文学批评学的建设由来已久,文学批评在学科上应该属于文艺学的学科范畴。它是一种有实践性的理论,它不是要空讲理论,而是要将文学的基本观点与当代文坛相结合。我们过去讲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部分。文学批评是活的理论,它是文艺学最有活力、最具实践性的分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时期,有一些高校的学者就注意到文学批评学体系的建设问题。那时候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先需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先搞了一本叫做《文学评论教程》的教材,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以讲义为基础完成的。我和王先需认识以后,交流了想法,就在1988年的春天,在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学批评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鲁迅文学院牵头,武汉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和社科出版社几家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文学批评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对文学批评学若干问题的研讨外,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计划搞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写一本关于文学批评学的书。会后开始策划这本书,由王先需、我和华中师大的师生来承担写作任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刚写到一半就流产了。在鲁迅文学院,我除了承担教学和行政工作外,当时还想搞3门学科建设:一个是文学批评学,一个是现代文论学,一个是作家学。作为鲁迅文学院,不能光靠讲座来教学,靠讲座培养作家只是一种速成的办法,也不能开一般的普通高校的课程,因为学们都是读过大学来进修的,他再听这些课就没有意义。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开出这3门课,写出这3门课的讲义,但是后来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搞成。文学批评学我只写了一两章,没能继续下去。

文学批评的任务至少三个方面:阐释、判断、超越。阐释就是阐释作品的内在因素、社会学含义和审美含义。好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隐藏在文本后面的,一个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其中的内涵阐释出来。要阐释首先要对文本深入解读、熟悉它,而现在我们很多评论家是不面对文本的判断,就是对文本的好坏作出判定,是好还是不好,是稍好还是稍坏,这个判断中包含有社会学、历史学、美学因素。最后是超越作品,要从文学现象和作家的创作活动入手,从理论上超越,提出理论性的见解。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后,茅盾写批评文章,他的批评文章并不比作品短。他认为战争文学可以这么写,这就在理论上有所超越。写有所超越的批评文章要有理论的勇气与态度,这种理论的勇气与态度基于美学判断的敏感和对文本的了解。

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是一个巨大工程,它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就学识储备上,它除了要把打好西方文艺理论的扎实基础外,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遗产作出整理。要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学,中国的文学批评遗产是一定要整理的。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只言片语到魏晋南北朝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要有一个基本的学科梳理。现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还有谁去愿意精读《诗经》?谁还能坐冷板凳去读《文心雕龙》,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做到真正理解?但是要搞文学批评

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当下,我们开始关注正能量。那么,正能量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善良,当然是一种正能量;但是,当我们独处时,又如何发现正能量?宋生贵《美在身边》(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出版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可它的出版,多多少少却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的正能量,来自他发现的、美是积极的,它给每一个个体传递着正能量,让人心情舒畅,也同时会生出真、善、美。

正如宋生贵在《美在身边》这本书的“自序”中提到的那样,关于美的争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研究过美,得出的答案多少令人沮丧:“美是难的!”宋生贵是美学家,从理论层面上讲述美,应该有他一套学术上的思维和方式。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阅读在当下成了难题,更不用说那些条条框框。好在《美在身边》中,宋生贵并没有用专业的理论知识,给我们讲述枯燥的知识,而是用70余篇短小精悍的散文,与读者分享了他认为的“美”,和他身边的“美”。

关于这些短小的随笔和散文,宋生贵有自己的想法,他在自序中说:“我为自己确定的行文风格是:能具体者绝不抽象,能通俗者绝不艰涩,能生动者绝不板滞,能有趣处绝不枯燥,能简朴者绝不繁缛,能浅进者绝不深奥,使文章尽可能做到自然畅达,平易近人。”

因此,《美在身边》的风格,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不能因为书中的篇幅不是长篇大论,就否定和看轻书著的分量。在这些随笔的写作中,宋生贵以一位学者的风范,旁征博引,用流畅的文字抛出自己的观点。笔者在前不久看了台湾文艺美学家蒋勋的两本书:《孤独六讲》和《生活十讲》。如果不细心研读,就不会发现那两本书是在向你讲述同一个主题下的美学观点。书中的文字太美,那些专业写作散文的作家,或许没有几个人能够把汉字运用得那么美。《美在身边》一书收录的作品,短则千字,长也不超过3000字,但字字见智慧,字里行间流露出学者的风范。书中有一篇叫《化“丑”为美说情趣》的散文,千把字的篇幅里,作者引齐白石、郑板桥、罗丹为例,又举流传于民间的钟馗与《白蛇传》,讲述了“美”与“丑”相互转化的原理。只有细细品味之后,才发现这篇小文的容量其实并不“小”,“小”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身为教授,宋生贵平时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作为作家,他也像一位长者娓娓道来,不仅要让读者知道美的存在,也要让读者去发现美。写身边的美,作者在名为《村外绿树村中画》一文中写道:“进入村中,家家房前屋后多半是高杨壮柳,荫檐蔽屋……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人们在田里干完了活,顺着林荫道向村中走去,因凉爽舒适而滋生的快意是难以言说的。”普通的村落,普通的劳动场景,在作者的眼中,滋生出了不一样的美,从自然之美转为人的美(劳动之美),看似是在阐述自己心中的美,实则是告诉大家一种审美的方法。如若是在课堂之上,不知要引用多少哲人的理论成果才能讲清楚的审美问题,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变得通俗易懂。

《美在身边》收录的文字,涉及内容中有不少是花草鸟虫,文人墨客,书法绘画,散发着浓重的文人气息。其中也有一些作品虽然文字上温文尔雅,却像一根驱病的银针,指出了生活中的不美(丑)。在《由衷赞美容而想到的》一文中,作者就运用“表里和谐”的原理,指出了一窝蜂美容的利弊。这样一篇观点犀利的文章,作者也充分考虑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站在他人的立场,让自己的批判对象可以有台阶下。这样温文尔雅的批判,提升了书中的儒雅气息,既“治病救人”,又尽量让“患者”少一些疼痛。

综观全书,作者强调的观点,是“美在身边”,美每时每刻都等着人们去发现它。作者在自序中,引用了朱光潜《谈美》中的一段文字:“慢慢走,欣赏啊!”在电子产品占据我们绝大部分精神生活的今天,这句话的意义显得格外重大。如果在忙碌中拿起《美在身边》这样一本书,定会给你一个新的方向,让你的心灵踏上寻美之旅,沿着开满鲜花的小路一直向前。

学子在游走中沉思

□刘川鄂

古人云,身体为生,心得为存。身与心,一个是物质实体,一个是灵魂世界,两者默契相伴,一物相随。没有身的践行和游走,就不会有心的感悟与沉思。李鲁平的《身与心》(中国青年出版社),正是他多年游走在文学前沿的“心声”,是一次践行千里之后的心力喷发,也是他继《政治漩涡中的作家们》《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和《文学艺术的理论视域》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多年置身于文坛当中,一路走来,默默耕耘,不断收获,李鲁平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其情可嘉!

《身与心》是一本“厚重”之作——内容丰厚、思想深沉、观点睿智,融入了李鲁平近年对文坛的动态考察与审慎思考,有许多观点独到老练、深刻深沉,具体说来,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这本评论集关注当下,发掘新人,及时“捕捉”活跃在一线的作家和作品,充满了可贵的探索精神。《身与心》不是封闭世界的孤独心语,而是智者游走万里之后的崭新发现,作者李鲁平犹如一位探险家,深入到文学最前沿,搜索有价值的作品,力挺有潜力的文坛新秀。像书写民族日常生活智慧的再正万、坚守孤岛题材的朱朝敏、关注内心和精神世界的阿满、发掘日常生活道德价值的吕幼安,等等,这些评论界关注了不少,但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新人,李鲁平给予了热情关注,概括他们作品的艺术特点,诠释他们的创作理念,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并指明他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指点江山,至诚至真”,李鲁平完全没有名家的傲慢和长者的清高,却如兄长一般亲切真诚,谆谆细语,入理入人。“赵燕飞的叙述文字和叙述方式,具有一种像蝴蝶翻飞的灵动感……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对虚拟世界的独特审美追求,尽管如此,我依然希望他们对小说的结构保持更高的尊重,对汉语言的纯洁保持更加神圣的态度”。赵燕飞是湖南的一位青年女作者,无疑是才华的,在大量阅读她的作品的基础上,李鲁平给予了中肯点评和由衷希望。此外,还有山西土家族青年作家陈克海、新疆青年女作者张好好、湖北文坛新秀陈旭红,等等,这些充满青春朝气和文学梦想的青年,李鲁

平静心致气阅读他们的作品,阐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说实话,一个在文坛“混迹”多年、学养颇深的名家,以诸多精力和时间去关注默默无闻的“晚生代”,去大量阅读他们的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作品,本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李鲁平做到了,而且做得很“低调”,《身与心》就体现了他的这种可贵精神,发掘后起之秀,甘为“孺子牛”。

其次,这本评论集探讨的对象非常丰富,集纳了当下文坛的“现象与焦点”,“日常与非日常”,充满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理修养。李鲁平没有把关注的视角集中在某地或某一时期的作家身上,而是放眼当下文坛,或品“老将”的新作,或评新人的新书,或解读某些文学现象,还涉及到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剖析,涉及到民族文学的内容,题材广泛,理论扎实。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辑“现象与话题”,探究“生态文学”、“身体叙事”、“伦理批评”、“70后作家现象”、“打工文学”和“文学主体性”等一些前沿话题,论述稳健,具有较强的理论前瞻性;第二辑“瓦解与坚守”,侧重分析在时代裂变的背景下,作家们的精神坚守与艺术追求;第三辑“日常与非日常”,着力于解读“日常叙事”的非日常意识;第四辑“身与心”,阐释的都是新作的精神内蕴,以散文鉴赏居多;第五辑“对话”,与新老作家当面对话,真实又亲切。整本著作兼用“生态文学”、“伦理批评”、“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多种理论,彻头彻尾散发着理性的思辨色彩,又不时诗性语言,显得游刃有余,大气爽朗,精彩纷呈。

再次,这本评论集有一部分内容为“对话”的方式,与作家面对面交流,品评新书新作,观点碰撞,思想交锋,充满了新锐的质感和现场感。“对话”内容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看似冗长,实乃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与许辉、姜贻斌、肖克凡、董立勃、叶梅、蒋韵、李佩甫共七位作家的对话中,李鲁平以质朴的语言,深刻的见解,分别探讨了他们各自作品的人物性格、主题内蕴和艺术价值。我总以为,对话式的评论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思想与知识储备,它极富挑战性,很多由“对话”产生的观点往往是灵光一闪

的睿智之思,在一种坦诚交流与思想碰撞中飘逸而出,让人无法设防、不可阻挡。在对话中,李鲁平一语道出许辉小说的精神是“对所见的世界保持一种少有的克制,对不曾谋面的世界保存着隐忍的渴望,充满着要遇见的欲望”,指出姜贻斌的小说有“发狠”的湖湘味和“乖恣”的人物;认为肖克凡的小说在历史和时代中呈现了工业的内涵和价值;肯定了叶梅在促进民族文学繁荣方面所在的努力;概述了李佩甫写透了中原大地。不难看出,此时作为读者的李鲁平与作家们的对话真诚又热烈,由对话产生的思想碰撞引发了多次的情感共鸣,他们或捧腹大笑或点头默许,让我们似乎体会到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难道不是文学评论的一种至美境界?尤其在蒋韵的交流中,李鲁平深情地说道:“您是一位有理想的作家,从您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一种简洁与复杂、纯粹与丰富、雍容与尖锐,读到了一种与热血、与挚爱、与真理一样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写作”,这种精辟的解读令蒋韵佩服至极。可见,一个评论家难以抑制的激情多么令人感动!在对话中,李鲁平彰显了他诗人的本色,感性、赤诚、热烈和丰厚。当诗人与评论相遇,当感性 with 理性相融,这样的评论集想不出彩都难啊。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李鲁平原本是一位诗人,对生活,对诗歌充满了挚爱,但他又是一位清醒的思想者,多年来在文学的世界里漫游行走,且唱且吟,一路高歌,其人其文都充满了智慧和柔情,朴实与浪漫。诚然,依个人拙见,《身与心》在题材的选择与组合上,若能与结构的安排保持高度一致,那将更为精彩。不过,与著作中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论述相比,这实乃微不足道了。王阳明曾强调知行合一,如在行中,方知在知。“身与心”在生命的舞台上,就是知行的合一。其实,作为厚积薄发之作,李鲁平的《身与心》正是王阳明这句至理名言的实际践行和完美呈现。最后,借用易飞曾评价鲁平的一句话:“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收获了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我认为,《身与心》绽放了一位评论家的思想锋芒和风度,这是智者的游走与高贵的沉思!

发现美是人生的幸福

□王 昉